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张展

内容提要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 日本侵华 汪伪政府 日汪关系

1940年上半年,日本当局一边扶植汪伪政府,一边急切地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交涉,其政策重心究竟何在?到了下半年,日本当局决心进入“大持久战”阶段,基本停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其决策背景又是如何?就此学界著述颇多^①,但仍有研究的余地,本文利用日本外务省和中国派遣军^②的部分档案,进行对比研究,希望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1940年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背景、变化过程和内部争论的情况。

^① 中文著作主要有余子道等人的《汪伪政府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闻少华的《汪伪政府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还有一些个人日记、回忆录等。如,犬养健著,任常毅译《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等。在日文著作方面,有小林英夫《日中戦争と汪兆銘》(吉川弘文館,2003年)、土屋光芳《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権》(人間の科学新社,2004年)、広中一成《日中平和工作の記録:今井武夫と汪兆銘・蒋介石》(彩流社,2013年)、土屋光芳《「汪兆銘政権」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考察》(人間の科学新社,2011年)、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成文堂,2009年)、上坂冬子《私は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文藝春秋,2002年)等。在论文方面,主要有杨天石的《“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藤井志津枝的《一九四〇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钱永铭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等。

^② 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整合侵华日军的基础上,于1939年9月设立中国派遣军,这是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设立的第一个总军,因而其文件多以“总军”自称,而本文为避免混淆,概译为“中国派遣军”。

一、汪伪政府的“谋略政府”性质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与中国新政府合作,调整两国邦交。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决心否定国民政府,与自己扶植的在华代理人“调整两国邦交”,以确保在华侵略利益。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分别于北平、南京成立。

但是,伪政府的实力有限,对沦陷区的统治尚赖日本维持,要“调整两国邦交”实属勉为其难。日本当局认为,有必要统合现有傀儡政权,扶植一个“实力政府”。1938年7月8日,五相会议^①通过《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要求“在继续强化现有的各亲日政府实力的同时,努力将之统合为一个政府”,使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借此“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②

至1939年,日军虽然仍保持进攻势头,但攻势渐显疲态,而国民政府并未屈服,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与之同时,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的战争机器则陷在中国战场,国力不断被消耗。日本当局急切希望尽早从中国抽身,遂加强了对华“政治工作”,在诱降国民政府的同时,继续推动各伪政权的整合。1939年10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事变处理和相应的外交措施》,提出“从速促进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处理事变的第一要务。”^③“新中央政府”的首脑被指定为汪精卫,日本当局希望汪精卫发挥自身在国民党内外的影响力,发起“和平运动”,并统合华北、华中中的伪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体大力宣扬“汪派的和平运动已扩展至中国全境”,“围绕着汪派的和平运动,事变正孕育着划时代的前景”,“事变处理进入了新的阶段”。^④日本政府则公开宣称“帝国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期待成立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⑤

与日本当局的期待相左,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未动摇抗战根基,汪精卫阵营实力毕竟有限,而重庆国民政府并未走向崩溃,仍然坚持抗战。如果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对于日本当局而言,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当局对其“正式承认”,那么要绕过汪伪政府,同重庆政府进行中日会谈,就难以自圆其说。

扶植汪伪政府只是日本当局侵华“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并非不可替代。既然汪伪政府难以满足日本当局的预期,那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要求暂缓扶植汪伪政府的声音,如华北方面军、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⑥分别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就持这种意见。

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遭到了怀疑。华北方面军认为,在无法靠实力征服

① 五相会议,系日本召开的由内阁首相、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参加,决定国家内政外交重要事项的高层会议。

② 「支那現中央政府にして屈伏せざる場合の対策」(1938年7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398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十四卷(A-1-1-35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事变处理ト之ニ対スル外交的措置」(1939年10月24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二冊』、六一書房、2011年、1062頁。

④ 「事变第3年の足跡(4)/事变处理篇 厳然・続く興亜の大業——新政権と協力闡明」、『朝日新聞』、1939年12月25日。

⑤ 「新政権との提携確認 事变处理策愈核心へ きょう重大興亜院会議/あすの閣議に附議」、『朝日新聞』、1939年11月1日。

⑥ 小川平吉(1870—1942年) 政友会元老,历任司法大臣、铁道大臣等职,1938年在香港进行“重庆工作”。

中国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央政府”,以促进重庆国民政府从内部瓦解,这是一种“谋略行动”。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过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意义,还必将导致“新中央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并立对峙,不利于收拾局面。^①小川平吉也认为,日本期待“通过汪扩大在中国的统治”,“促使蒋政府崩溃”,这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政府仍有相当军政实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汪精卫成立的政府则“恐怕影响力很难及于占领地之外”。^②

华北方面军和小川平吉还认为,“重庆工作”仍存希望,不应因汪伪政府的成立而受到阻碍。华北方面军主张将联系重庆国民政府的实力派放在优先地位,“有情报显示,孔祥熙、张群等人并不排斥交涉”,“只有促使蒋政府崩溃,同重庆方面高层合作,建立强力政府,以此作为唯一的中央政府,才是真正的整顿时局之道。”^③联络重庆国民政府“高层”的小川平吉报告,当局公开支持汪伪政府,对自己参与的“和平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9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支持汪政府的声明,使孔祥熙对日本的意向产生怀疑,原本已经大有希望的孔祥熙工作,随之遭到重大挫折。^④

利用第三国进行调停,也是日本当局解决“中国事变”的重要选项。华北方面军认为,英美可能会胁迫蒋与日本进行和谈,从而防止蒋介石完全倒向苏联。^⑤1939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⑥提出《事变解决秘策》,设想在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之前,由日本向英国提供在华特殊权益,利诱英国参与中日调解^⑦;而一旦日本当局扶植并承认汪伪政府,这对拉拢英国调解是不利的。1939年10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透露,英国认为汪伪政府“徒有其名,而全无实力”,日本与其交涉“和平”,可以说是“虚幻的”。^⑧不仅英国看淡汪伪政府的前景,即便是日本的友好国德国,在汪伪政府建立之初,也认为其发展前景有限,暂时不准备加以承认。^⑨

虽然反对意见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在汪精卫等积极筹备汪伪政府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仍在“汪工作”与“重庆工作”之间摇摆不定。《事变解决秘策》提出,如果汪伪诸人反对日本的“重庆工作”,日本可以“弃汪求蒋”:“若汪方阻碍日本与重庆之谈判,可据情况将其排除,虽形式上仍然与新中央政府交涉停战,然汪蒋合并工作以重庆方面为主体,事若至此,需引导国内舆论之转移(根据上文内容,应指将全力拥“汪”反“蒋”的舆论转为“与蒋和解”——引者注)。”^⑩1939年10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出台《处理事变第1期最高指导案》,指出“应使汪方认识到,要成立强力政府,乃至整顿时局,获得重庆方面的实力,实属必要。”停战作为诱降重庆国民

① 北京大使館「新中央政府樹立は急ぐ必要がないとの北支那方面軍の軍中央への意見上申について」(1940年9月22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六一書房、2011年、504頁。

② 小川平吉「重慶方面關係經過概要」(1939年10月)、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514—519頁。

③ 北京大使館「新中央政府樹立は急ぐ必要がないとの北支那方面軍の軍中央への意見上申について」(1940年9月22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504頁。

④ 小川平吉「重慶方面關係經過概要」(1939年10月)、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514—519頁。

⑤ 北京大使館「新中央政府樹立は急ぐ必要がないとの北支那方面軍の軍中央への意見上申について」(1940年9月22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504頁。

⑥ 1937年11月20日,日本当局设立“大本营”作为天皇直属的对华作战最高统帅机关。

⑦ 大本营陸軍部「事变解决秘策」(1939年6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721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關係資料(大本营陸軍部の部)昭和12年5月29日一昭和15年12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⑧ 上海領事館「カ—英国大使が自らの和平腹案を重慶側に提示する心算との諜報報告」(1939年10月)、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512頁。

⑨ 来栖三郎「南京政府承認問題に対するドイツの態度について」(1940年4月5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1075頁。

⑩ 大本营陸軍部「事变解决秘策」(1939年6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721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關係資料(大本营陸軍部の部)昭和12年5月29日一昭和15年12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政府的前提条件,“是日本和重庆方面之间的问题,因此必然存在日本与重庆方面的停战交涉”。^①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摇摆,招致汪伪方面和日方从事“汪工作”人员的不满,认为日本当局没能充分认识到汪伪政府的意义,双方缺乏互信。主导“汪工作”的影佐祯昭感叹“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事务当局中,也有对于成立汪政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热心于支援和平运动者”,“汪政府要人之中,有不少人对我哀叹说日本不相信友人。”^②汪伪方面对此也有着相似意见。日本当局在没有知会汪伪方面的情况下,进行着联络重庆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周佛海得知后颇感失望。“今井、臼井赴港,犬养等在沪从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③

虽然日本当局认为“应使汪方认识到”“重庆工作必然存在”,周佛海也明确表示不会反对“重庆工作”。在接待来访的日本众议员神尾正雄时,周佛海声言“余告之以中央政府即使组织,绝不至阻碍全面和平。”^④但如果日本当局进行的“重庆工作”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那么汪伪方面则难以接受。周佛海得知日本当局可能不会立即承认汪伪政府后,向犬养健表示“余谓余辈绝不反对与重庆谈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认,则宁可不要组织。”^⑤同时,周佛海认为“重庆工作”的不确定性极强,对此不可寄予过多期望。“日本以为蒋现甚感困难,亟于求和。吾谓不然,蒋正以为抗战形势好转,岂有求和之理?如日方观察错误,则蒋以为日本已陷于困难地位,调子将更强,是则欲和而反不得和也。私意须水到渠成,此事非急可得到。”^⑥就此,周佛海屡向日本方面警示重视“重庆工作”、忽视“汪工作”的危险。如,他向犬养健评价“桐工作”说“当时主张在港所接洽者果属确实,则和平有期,政府可不组织。惟接洽者为重庆极不重要之人,如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⑦还告诫今井武夫,不应因“重庆工作”影响汪伪政府成立“大约和平并非其意,欲借此破坏我政府,则系实情,故告今井,请日方注意。”^⑧周佛海要坚持的,可能是即使存在“重庆工作”,日本也应以“汪工作”为中心,由汪精卫主导收拾局面“组府势在必行,但中国不能不统一,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在会见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藤外松之际,周佛海要求加藤明确在“新政府之地位”“议和条件”上日本的态度,求得了“无论如何当以新中央为中心”“将来即与重庆谈判,条件亦不致吾辈目前所谈者于中国有利”的回应。^⑨

1940年初,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当年对华方针,决定将1940年的对华工作分为前半年和后半年两个阶段。前半年,继续加强“解决事变”的努力,即“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如果效果不彰,后半年则逐渐转入“大持久战”阶段,基本放弃“重庆工作”,准备与重庆国民政府长期对峙,即使“努力诱导局部停战,并与汪合并”,目的也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确立新政府的武力和财力基础”,而非“重庆工作”的延长,显示了以“汪工作”为中心的方针。^⑩可以看到,中国派遣军试图通过划定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方针,以解决在“重庆工作”和“汪工作”间摇摆的

① 大本営陸軍部「事变解決处理第1期最高指導案」(1939年10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726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大本営陸軍部の部)昭和12年5月29日一昭和15年12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第57页。

③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3月19日,第265页。

④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2月26日,第252页。

⑤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1月13日,第230页。

⑥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1月29日,第239页。

⑦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3月19日,第265页。

⑧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6月14日,第308页。

⑨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1月15日,第231页。

⑩ 総軍司令部「昭和15年事变現地処理方針」(1940年1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48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问题。

虽然中国派遣军的上述方针声言要在1940年前半年“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但考虑到汪伪政府将在这个时期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派遣军仍将“重庆工作”置于对等的地位，足见中国派遣军对“重庆工作”的重视。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同期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将“重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新政府成立前的努力，至三月左右为止”，以及“新政府成立后的努力，持续半年左右，若不奏效，则转入大持久战”；并强调汪伪政府的成立，不能成为“重庆工作”的障碍：汪伪政府“成立之际，务必要留意其对内、对外措施，不可闭塞与重庆政府合并之途”。“在事变解决或实行大持久战后，则将其当作正式政府加以发展”。可见，中国派遣军将汪伪政府“当作正式政府”，是在“重庆工作”成功，即“事变解决”，或者“重庆工作”“不奏效”，日本当局决心进行“大持久战”后的打算。在此之前，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的筹码性质更为浓厚“对汪工作不必故意放缓或加急，而应该自然地迈进，成立后根据其实力加以对待，权且将其当作谋略政府。”只有“解决的努力无法奏效，新旧政府对立”之际，才将汪伪政府由“谋略工具”，转为“交涉对象”。^①

所谓“成立后根据其实力加以对待”，即包括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问题。关于日本承认“新中央政府”的时机，早在1938年7月五相会议通过的《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中，便已提到“帝国对新中央政府之承认，当待其具备中央政府之实之际，从速行之”。^②汪伪诸人的“和平运动”原本就实力有限，又如周佛海所言“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目前形势，险恶万分，加以中央政府三月内不成立，则和平运动即将解体也。”^③汪伪政府成立之际，无疑难以符合日本当局所要求的“具备中央政府之实”，日本当局对其承认，自然也成为问题。

二、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对汪政策的推移

汪伪方面希望，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能即时加以承认。1940年2月27日，周佛海告知犬养健“如日方不决定承认中央政府，吾辈即停止组府工作。”^④3月2日，汪精卫也向日本方面表示“新政府是否具有实力，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是否具有稳固地位。日本迅速正式承认，赋予其新中央政府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⑤

与汪伪方面的希望不同，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的实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对汪方针。因此，日本当局决定暂不承认汪伪政府，而是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派遣“特派大使”与其交涉“基本条约”，对汪伪政府的正式承认，与签订“基本条约”捆绑，暂不敲定具体日期。^⑥

实际上，“正式承认汪政府，是在这项条约实质完成整三个月后的事”。^⑦日本当局秘密进行的

① 総軍参謀部「事变解決ニ関スル極秘指導」(1940年1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47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支那現中央政府屈伏の場合の対策」(1938年7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397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十四卷(A—1—1—35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2月22日，第250页。

④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2月27日，第253页。

⑤ 上海領事館「新政府樹立後における日本の即時承認を汪兆銘希望について」(1940年3月2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二冊』、1059頁。

⑥ 有田外務大臣「新中央政府成立に際するわが方措置振りにつき通報」(1940年3月29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二冊』、1062頁。

⑦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第249页。

“重庆工作”，一直对扶植和承认汪伪政府事宜产生着影响。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的1940年3月15日，日本军方文件《目前对华处理要领》（以下简称《要领》）要求，“若停战协议在汪政府成立前签署，则促进汪与重庆政府的合作，可接受汪提出的延期或中止成立新政府的请求”；“若成立政府在先，我方应尽可能在促使重庆政府接受现实的同时，对承认新政府加以保留”；“不管哪个在先，均应积极促进汪蒋合作，签署和平条约”。^①毋庸置疑，《要领》对承认汪伪政府加以保留，说明其仍对“重庆工作”抱有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重庆工作”。

《要领》计划“重庆工作”和“汪工作”同时进行，一方面是因为“重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此阶段汪伪政府的成立，相当程度上是发挥与重庆交涉的“谋略作用”。

首先，《要领》认为“为促进、隐蔽桐工作，应对以汪为中心的新政府的支持具体化”，通过对汪伪政府的支持，可以对重庆国民政府施压，同时掩护秘密进行的“重庆工作”。

其二，成立汪伪政府，并促进汪蒋合并，通过汪伪政府的缓冲，可以在保持近卫声明立场的前提下，实现与蒋介石的交涉。由此，对汪工作随时可以转变为对蒋工作“应派遣特命全权大使，指导、参与作为承认新政府前提的日华新关系条约的交涉。若此期间桐工作取得突破，则全权大使的任务，应变易为同汪蒋合作后的国民政府交涉、缔结日华新关系条约。”

因此，“新政府成立工作，并非仅为拥护汪政府，而是要促进一实力政府的出现，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落脚点实际还是在“实力”问题上。就此，日本当局要求汪伪方面“了解”“支持”日本当局的“重庆工作”，给予日本当局以“谅解、感谢”。^②

由此，“重庆工作”的进展对汪伪政府的成立造成了巨大影响。1940年3月，“桐工作”似现希望，板垣征四郎、犬养健遂分别会见汪精卫、周佛海，要求延期举行原定于3月26日的“还都典礼”。犬养健告诉周佛海在港会谈“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廿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四月十五”。周对此坚决反对“余告以延至四月十五，此间必崩溃，故最迟不能过三月卅一日。”^③日本当局内部也有担心“本运动（即桐工作）是蒋为了阻止汪政府成立而进行的”，主张“按照原计划进行成立汪政府的工作”的声音^④，加之“再拖延下去，恐怕就要对已经做好准备的当地中国方面以及整个形势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就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举行和平政府还都典礼”^⑤，由此也可见日本对“重庆工作”和“汪工作”的矛盾。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因此根本转变。4月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要求“新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庆工作”^⑥，又在5月8日通过《当前处理事变方针》，规定“事变解决”的整体指导思想，仍应遵循1月1日通过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

日本当局将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和对南京的“和平政府”这一对矛盾体“齐头并进”，不但

① 本段及以下三段均出自「当面对支处理要领」(1940年3月15日)，选自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支那事变战争指导関係綴」原文在起案者一栏留阙不记，但其他并列的文件均出自五相会议或大本营陆军部等，可推断其应为较重要的文件。在「桐工作目次」、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1110430900、桐工作関係資料綴 昭和14年12月—15年11月(2部中の1)(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中记载其来自“参本”，结合上下文，可能指“参谋本部”。

② 総軍参謀部「事变解決二関スル極秘指導」(1940年1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4700、支那事变战争指导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③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40年3月19日，第265页。

④ 「軍令部第一部長所見」(1940年3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1110431400、桐工作関係資料綴 昭和14年12月—15年11月(2部中の1)(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⑤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16页。

⑥ 総軍参謀部「現事態ニ鑑ミ戦争遂行上現地ニ於ケル一元的处理強化二関スル施策」(1940年4月1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5100、支那事变战争指导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使得两者互相影响,更让汪伪方面心存不安,加上“桐工作”前景不明,这种“并进”的政策势必难以长期化。于是,《当前处理事变方针》在确认要结合“汪工作”和“重庆工作”来“解决事变”外,强调“重庆工作”不可漫然无期,应该“以正式承认新政府为中心,政治、军事战略相结合,大规模地、有计划地采取措施,为包括重庆方面在内的事变解决,尽最后的努力”,“重庆工作”无法取得成果之际,则“在年内下定决心,正式承认新政府”。这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中心,将由谋求停战,逐渐转向扶植汪伪政府,且使之“作为大持久战战略的一环”,服务于日本战略目的。^①

中国派遣军参谋部于7月27日制定《终结桐工作指导方针》,要求不能再逡巡于低层次的会谈,应从速争取高层会谈,无论实现与否,尽快对“桐工作”有所了结。“本工作现阶段的根本思路:将诱出敌国主权者进行直接谈判作为主要目标”,“万一能确定重庆方面的诚意”,则“停止针对具体条件的争论,先行实现高层会谈”,“就算交涉失败,也能明了敌人真实意图,鼓励全国全军奋起,由此下定打十年战争的决心,这样反而会推动战争尽早结束”。^②

中国派遣军通过“桐工作”实现“高层会谈”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中国派遣军在1940年8月10日,日本海军在9月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③9月28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在《今后对重庆工作处理要领》中承认,“桐工作进行至此,无论是把握重庆真实意图,还是发挥其谋略价值,均无收获”,并决定“今后对此不抱期待,也不加强对应措施,仅作为一条情报源残存”。^④

“重庆工作”的挫折,预示着汪伪政府在日本当局战略中的位置将得以提升。日本当局逐渐将战略方针转向“大持久战”,决心抑制对“重庆工作”的期待,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扶植。“在条约准备完成后,即行承认新中央政府,移向对大持久战的指导”,“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使其配合我战争战略。新政府在得到承认后,也须有实行大持久战的决心。”^⑤承认汪伪政府,加强汪伪政府实力,使汪伪政府具有协助日本统治、支援日本侵略战争的能力,这也是日本当局对汪方针的一贯要求。

1940年初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中“预想承认新政府的时期在本年年末”。^⑥“桐工作”基本停止后,距年末还有几个月时间,此际日本外务省在“重庆工作”上表现活跃。

9月3日,外务省提出“和平”条件案,认为只要能实现“汪蒋合并”,日本可以对其形式不加干涉,“汪蒋合并”不必采取南京政府收编重庆政府的形式,蒋介石非但可以不下野,甚至可以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让汪精卫下野。这一方案与近卫声明中“不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精神相悖,且其认为可以在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对手,但不发表相关声明,“和平”条约则与“汪蒋合并”

① 総軍参謀部「現下事变处理方針」(1940年5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55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総軍参謀部「桐工作終結指導方針」(1940年7月2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84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钱永铭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④ 総軍参謀部「今後二於ケル対重慶工作处理要领」(1940年9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63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総軍参謀部「桐工作終結指導方針」(1940年7月2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84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 総軍参謀部「事变解決二関スル極秘指導」(1940年1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47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后的“新政府”签署。^① 外务省在9月16日提出的方案中,更表示“汪蒋两派重要人物的地位和未来的保障,尽量交由中国内部处理”。^②

9月9日,外务省出台《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案)》,决定“全面进行和平交涉”。在交涉中,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同新政府的外交调整已经整备的现状”,借承认汪伪政府,对重庆政府进一步施压;一方面释放善意,“与其执拗于近卫声明,不如先行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③

外务省的另一份提案解释了提出此案的背景,那就是“随着日本准备承认汪伪政府,对蒋工作所余时间有限,情况紧急”,“不能将所有赌注压在派遣军进行的工作上”。一旦“和平工作”失败,与中国进行持久战,日本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如“国内通货膨胀、物资不足、社会不稳表面化(日本政府)面临庞大的预算压力”,在国际环境上“欧洲局势急速变化,日本政治、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对英美的依赖,需要南进确保资源、市场”,因此急切地要从中国战场脱身。^④ 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上书表示“缔结条约(即日汪基本条约)后,随着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则不可能从速实现对华全面和平,中日事变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战争。有必要努力在条约签署之前实现全面和平,即诱使重庆政府屈服。”第一课的上书还强调,与其将所有希望放在中国派遣军进行的“谋略工作”上,不如由政府进行其他的“和平工作”。^⑤ 9月16日,外务省通过《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和重庆政府的动向,帝国政府应从速进行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直接交涉对手的全面和平交涉。”同时在9月9日的《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案)》的基础上,增加了“将以前谋略机关的交涉一概停止”一条,表明反对军方以往的“谋略工作”。^⑥

外务省反对将赌注放在军方的“谋略工作”上,考虑在进行政府主导的“重庆工作”的同时,可以多线齐头并进。一方面,《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对重庆的全权交涉代表,可以由总理大臣级别的人物担任,给予其充分的决断权。另一方面,为了联系重庆国民政府,外务省各部门建议广为撒网,如东亚局第一课提议“派遣经过政府授权的民间人士,如头山满或其子秀三郎等重庆政府信任的人物去重庆,或者在上海、香港方面,联系接近蒋介石的人物,比如周作民、钱永铭、张季鸾等,或者陈诚、戴笠的代表”。^⑦ 外务省调查部第一课的提案附表,罗列了“重庆工作”尝试进行的诸多项目:“总军及参谋本部的宋子良工作,喜多中将的王克敏与司徒雷登、傅教授、章秘书工作,南京政府的周佛海与陈宝骅工作,李择一——宋子文,何澄——吴忠信——蒋介石,山下龟三郎——杜月笙,头山满——秀三、小川平吉、萱野长知——杜石山——蒋介石(秋山定辅、有田八郎、松冈洋右),百武(报知)——戴笠,孔祥熙——樊光——坂西中将,孔祥熙——乔辅三——领事

① 外務省「日支全面的和平實現の見地より考察せる和平条件(条約)問題」(1940年9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36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外務省「支那事变急速処理要領(案)」(1940年9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6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外務省「支那事变急速処理方針(案)」(1940年9月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1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支那事变急速処理方針(案)に対する卑見(内田事務官)」(1940年9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2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東亜局第一課「日支全面的和平処理方策に関する試案」(1940年9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38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 外務省「支那事变急速処理方針」(1940年9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53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 東亜局第一課「日支全面的和平処理方策に関する試案」(1940年9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38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馆 钱永铭——(李北涛)——领事馆 和知少将——白崇禧领导的广西派。”^①

近卫声明成了“重庆工作”的障碍,外务省也准备对其进行实质性修正。9月24日,《关于中日全面和平的急速发展》提出了“中日和平”的草案,其中建议“停战后发表‘为了中日全面和平,从大局着眼,将过去的一切付诸流水,为东亚重建而建立中日友好关系’(实际上修正近卫声明——原文注)。”^②

三、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之际的政策变化

日本外务省在军方的“重庆工作”失败后的活跃,一方面是其同军方的侵略立场一致所然,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有同军方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考量。1940年4月,阿部信行被任命为“特派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交涉。临行前,阿部信行接到首相、外相共同指示“解决中国事变的原动力,是皇军活跃的作战,贵官在执行任务时,务必留意此点。”^③阿部信行虽然是日本政府的“特派大使”,但实际上主要负责日汪基本条约的交涉,中国派遣军则掌握着更大的对华事务的发言权。1940年4月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通过《鉴于当下事态、统一并强化当地事务处理的方策》,要求“确立派遣军的最高地位,当地的有关战争和事变处理的各种事务,由派遣军主宰、计划并指导”。^④5月8日通过的《当前事变处理方针》中,中国派遣军也要求各当地机关竭尽全力配合自身工作。在“重庆工作”方面,中国派遣军同样要求由自己“全面指导”“主宰”“统合”。对日本外务系统进行的“重庆工作”,中国派遣军要求“在东京制定的大纲”和“在南京的具体实行”,均需提前告知中国派遣军,由中国派遣军进行调节和整理。^⑤

中国派遣军力图主导“重庆工作”,乃至要统合日本各在华机关为其所用,外务省内部对此有

① 外務省「日支和平基礎条件」(1940年9月1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900、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格式依档案原件。文件中部分人名简介如下:喜多中将,即喜多诚一(1886—1947年),曾于1937年9月至1939年3月任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傅教授应为傅泾波(1900—1988年),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司徒雷登交往密切,王克敏曾通过傅泾波联络司徒雷登、宋子文等人。章秘书似为“桐工作”中同“宋子良”一起参加会谈、自称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的章友三,其人具体情况不详。陈宝骅(1907—1975年),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曾任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抗日战争时期以新生命书局总经理的身份在上海潜伏活动。李择一,生卒年不详,青年时期赴日留学,曾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过《塘沽协定》的签订,抗战时积极往来于中日之间。何澄(1880—1946年),实业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与日本交往密切。山下龟三郎(1867—1944年),日本实业家,主要经营船运业。秀三系头山秀三郎(1907—1952年),头山满之子。萱野长知(1873—1947年),大陆浪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等人过往密切,抗战期间积极奔走于“和平工作”。秋山定辅(1868—1950年),日本政治家、实业家。百武,似为百武末义,生卒年不详,原《报知新闻》记者。樊光(1886—1962年),原名崧骏,字震初,赴日留学后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北伐后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代理外交部常务次长、财政部浙江印花烟酒税局局长、财政部参事等。杜石山,亦作杜石珊,生卒年不详,早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戴笠的领导下与萱野长知等人进行谈判,并借此收集情报。坂西中将,即坂西利八郎(1871—1950年),日本政治家、陆军中将、贵族院议员,素有“中国通”之称。乔辅三,生卒年月不详,孔祥熙的私人秘书,代表孔祥熙同日本方面进行接触。李北涛,生卒年不详,交通银行职员,担任周佛海与钱永铭的联络。和知少将,即和知鹰二(1893—1978年),日本陆军军人,著名的“中国通”,曾任“兰机关”机关长,负责策反两广军队。

② 外務省「日支全面和平の急速なる展開に付て」(1940年9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5000、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特命全權大使二与フル内閣總理大臣及外務大臣会同指示」(1940年4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9600、支那事变關係一件 第三卷(A-1-1-3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総軍参謀部「現事態ニ鑑ミ戦争遂行上現地ニ於ケル一元的处理強化ニ関スル施策」(1940年4月1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51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關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総軍参謀部「現下事变处理方針」(1940年5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655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關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一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不同意见。7月底,“桐工作”宣告失败。8月,外务省内部出现要求由外务省掌握对华事务主导权的提案“统一国内体制的第一步,是统一处理中国事变的执行主体。”“首先,应该统一直接处理事变的机关。”“当下存在多种对华机关,政令不一,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损失巨大。”“外务省存在多年,既有的制度、行政系统完备。”“虽然外务省向来被视为软弱,但进行关键的改革后,其‘外柔内刚’的手法,反而可以取得更好效果。”“因此,外务省应当作为处理事件的核心机关,各相关方面应协助外务省取长补短。”这一提案还建议废除兴亚院,在外务省内“设置兴亚局,充当对华政策最高机关”,同时“将在华各公馆的经济部和总务科的一部分合并为兴亚部,作为对华政策的执行机关”。^①

外务省要在对华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就要强调自身相对于军方的优势,其中较明显的优势,当属对国际环境的综合把握和利用。外务省的“重庆工作”方案也体现了此点内容。外务省制定的《中国事变急速处理要领》中“强化对重庆攻势”部分的第一条,即是“外交体制之强化”。其中要求“从速与德意缔结同盟条约,并努力在对苏关系方面打开局面”,从而增加重庆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注意尽量不刺激英美等国,防止其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不能给第三国以我们即将对美国南方各地动用武力的印象,不可使重庆方面有和第三国联合的希望。”^②

在利用国际环境影响“中国事变”方面,中国派遣军也有着与外务省类似的想法。1940年6月,德国迅速取得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德苏间又存在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军内部有进一步亲德,并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要求,企图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来影响中国战场局势。6月23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评估了欧洲战场对东亚局势的影响,并提出为解决事变,应当进一步加强日德合作,争取建立亲德的战时政府,同时与苏联签订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的国际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问题”的影响。日本当局期待通过与德国加强关系,获取德国在中日问题上的更大支持。但是,德国期待从重庆国民政府获得部分战争资源,日本当局则难以满足其需要,这也成为要德国协助日本、施压重庆国民政府的障碍。^④对此,外务省认为,为争取德国在中日问题上进一步支持日本,日本可以给予德国在华特殊权益“一、认定德国在事实上仅次于日、满的第三优先国地位;二、约定供给德国所需要的一部分特定资源;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原则上给予同日本平等的待遇。”^⑤

外务省还希望借助日苏关系的调整,促进“重庆工作”的开展。“重庆方面坚持抗日和对第三国,特别是美、苏、英的期待密切相关”;“目前英国已逐渐没落,如果再失去美国或苏联的支持,重庆方面应该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而且“中共在中日和平工作中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同苏联关系的调整,也可以动摇中共的抗日意志,创造国共间的裂痕”。^⑥

① 外務省「支那事变处理实行主体ヲ完全ナル一元化トナスコト」(1940年8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2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外務省「支那事变急速处理要领(案)」(1940年9月1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6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③ 総軍参謀部「現地事变处理ニ資スル為ノ現下東亜情勢判断/処置/第1期 事变解決ニ関スル努力」(1940年6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132500、現地事变处理に資するための現下の東亜情勢判断 昭和15年6月2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来栖三郎「南京政府承認問題に対するドイツの態度について」(1940年4月5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一冊』、1075頁。

⑤ 外務省「支那事变急速处理方針(案)」(1940年9月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1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 外務省「日支全面和平の急速なる展開に付て」(1940年9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50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针对拉拢德国以推动“事变解决”的观点,外务省内有意见认为“现在日德关系尚不够牢固,要实现德国对中日交涉的介入,前提条件是实现日德间充分的合作。”而这样的后果是“可能导致与英国一战,且有可能遭到美国禁运,若不欲坐以待毙,则不得不控制荷属东印度,对外贸易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停止。”^①由此可见中国问题对日本当局其后战略选择的影响。日本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同盟,以及其侵略战争的扩大化,均与中国战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但抗击、分散了日本的侵略力量,也使日本被迫不断地调整侵略政策,难以保持统一、持久的方针。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的谈判也得以推进。不过,日本当局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降工作,一直效果不彰。随着渐近日本当局设定的1940年末的期限,日本当局不得不按照原定计划,准备承认汪伪政府。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就意味着进入与重庆国民政府长期对峙的“大持久战”阶段。早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决心实行持久战的时机,应当在“无法解决与国民政府之间的问题”或者“国民政府在实力上成为一地方政府”之际。^②经过三年抗战,虽然日本声称国民政府已经沦落为“地方军阀”,但实际上,如1940年11月外务省制定的《处理时局相关重要事项》中提出的“现在作战的目的,是控制中国大势,占据要冲,培养长期经营东亚的实力,使得国民政府因中原丧失而崩溃,或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③可见日本当局认为,让国民政府“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的目标仍未实现,故只能修订计划,实行“大持久战”了。

如前所言,根据日本当局的计划,决心实行“大持久战”的阶段,也是将工作重点转向扶植汪伪政府,准备加以承认的阶段。1940年11月,在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议上,首相近卫文麿表示“现时帝国难以进行使重庆政府崩溃的武力进攻,短期内重庆政府不会屈服,而南京政府已经成立,并正在逐步增强其政治力量,”“帝国于此际决心进行真正的长期战争,承认新政府,培养、强化其政治力量,使其具有协助我方处理事变的能力。”^④

在这次会议讨论中,陆军省、海军省都认为,不宜对“重庆工作”过度期待,要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拖延策略加以防范,必须最迟于1940年末承认汪伪政府。^⑤外务省也认为,同汪伪政府签订基本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符合日本的侵华利益,应该尽快进行。“本条约是帝国继续与中国的抗日势力进行大规模战争之际,帝国同在帝国军队占领区内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的,”“本条约不但对战争行为不加限制,且促使民国政府与我方密切合作解决事变”。^⑥参谋本部的说法更加露骨:“表面上,将汪政府视为中央政府,根本思想是通过承认汪政府,消除重庆进行的离间工作的希望。同时,将新国民政府当作中国事变中协助我方达成军事目的的机构(参照附属议定书第

① 「支那事变急速处理方針(案)に対する卑見(内田事務官)」(1940年9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142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二卷(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大本营陸軍部「事变対処要綱案(対現中央政府解決ノ場合)」(1937年12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558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綴 其の1 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外務省「時局处理二関スル重要事項」(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449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十五卷(A-1-1-3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政府大本营連絡会議二対スル条約案提出理由」(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320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九卷(A-1-1-35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大本营陸海軍部「支那事变处理要綱」二関スル所要事項ノ説明二就テ」(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589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綴 其の2 昭和13年1月—昭和17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 「大本营連絡会議における外務大臣説明要旨(案)」(1940年11月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449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十五卷(A-1-1-35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一条——原文注) 极端地说 就是准军政统治下(今后军政色彩将逐渐浓厚——原文注) 的一个傀儡政府。”^①

日本当局承认汪伪政府 既难以让自身面临的局势得到实质性改观 ,也未使汪伪政府的实力和前景发生什么变化 ,更未从根本上“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由此 ,虽然日本当局计划一旦承认汪伪政府 就搁置“重庆工作” ,但实际上仍对“重庆工作”抱有希望。日本军方认为“即便到了今日 ,如果重庆政府愿意主动屈服 ,与汪政府合作 ,那帝国也做好了宽容以待、息战讲和的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即便转为长期战 ,帝国对中国事变的目的不应有所变更 ,仍然期待通过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措施 ,促使重庆方面屈服。”日本军方甚至还希望 ,承认汪伪政府会带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的动摇“承认新中央政府 ,明示日本的坚决态度 ,可能会对重庆方面的动摇分子有所影响。”^②日本政府方面也表示:汪伪政府在各项协助日本事宜及“重庆工作上 ,配合我方各种措施 ,作为我方事变处理之一翼 ,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③ ,表现出仍不彻底放弃“重庆工作”的意向。

11月28日 ,日本当局决定于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 ,就算在此之前收到停战申请 ,也不变更计划 ,并在签署日汪基本条约后 ,逐渐停止“重庆工作” ,但“不停止对蒋和平之努力”。^④ 也就是说 ,日本当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 ,清理的是一系列诱降重庆的工作本身 ,其实并不放弃对蒋诱降:“向来之和平工作失于统一 ,误传帝国意图 ,不但使重庆方面轻视帝国国力、昂扬抗战意识 ,而且使南京政府也怀疑帝国之信义。有鉴于此 ,今后之和平工作 ,最重要的乃是各相关机关合作 ,帝国政府统一行使。以前的由军民实行的和平工作 ,应予清理。”^⑤

日本当局最终承认汪伪政府 ,也让汪伪方面诸人得以“安心”。11月24日 ,正在访日的周佛海会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表示“在御前会议力主卅日签约 ,但苟重庆明白表示可和 ,则当与汪先生商延期签约” ,周佛海即告之“唯恐中重庆拖延之计耳”。^⑥ 汪精卫也“对卅日能否签约 ,亦颇怀疑”。^⑦ 一直到28日 ,周佛海收到犬养健发来东京方面已经决定正式承认的电报后 ,方信“大约重庆和平之说已证实为子虚矣”。^⑧ 对于日本当局对“重庆工作”的期望 ,周佛海不以为然:“犬养电告 ,田尻、船津等自港来电 ,深怪承认国府 ,致影响和平 ,岂重庆真有和平之意耶?”^⑨

结 语

从扶植汪伪政府成立 ,到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几经摇摆 ,存在不同的对汪路线。一条路线是将汪伪政府当作与重庆国民政府交涉的筹码 ,扶植汪伪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放在

① 外務省「大本営連絡会議二関スル件」(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32000、支那事变関係一件 第九卷(A-1-1-35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 大本営陸海軍部「『支那事变处理要綱』二関スル所要事項ノ説明ニ就テ」(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589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綴 其の2 昭和13年1月—昭和17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支那事变处理要綱に関する質疑応答資料」(1940年11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183100、支那事变处理要綱 御前会議議事録 昭和15年11月1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大本営「11月28日第1回連絡懇談会 国民政府承認の件」(1940年11月2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245700、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議事録 其1 昭和15年11月28日—16年7月2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大本営陸海「『支那事变处理要綱』二関スル所要事項ノ説明ニ就テ」(1940年1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2120058900、支那事变戦争指導関係綴 其の2 昭和13年1月—昭和17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 ,1940年11月24日 ,第384页。

⑦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 ,1940年11月27日 ,第385页。

⑧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 ,1940年11月28日 ,第385页。

⑨ 周佛海著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 ,1940年11月30日 ,第386页。

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上,必要时可以放弃汪伪政府,即将其当作“谋略政府”;一条路线是以汪伪政府为日本当局的交涉对手,将重点放在扶植、强化汪伪政府上,培养其统治占领区,并增强其支援日本当局侵略战争的能力,将同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当作侧面工作。两条路线互相竞争又互相影响,汪伪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当局仍将其仅仅视作“谋略工作”的一部分,不急于正式承认。随着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失败和抗战局势的变化,日本当局不得不转换对华政策,汪伪政府作为其统治工具和利益代理人,得到了日本当局的正式承认。日本当局1940年对华政策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笔者简要总结如下表:

表1 1940年日本对华政策部分相关方关系表

| | 解决“中国事变”的看法 | 互相之间的态度 |
|-------|---|--|
| 中国派遣军 | “处理事变”的根本问题在于实力,汪伪政府实力不足,因而应通过军事、政治、外交手段,进行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重庆工作”失败后实行“大持久战”,将汪伪政府作为“大持久战”战略的一环。 | 试图统合、主导在华事务,促使日本外务部门配合其对华方针。在决心实行“大持久战”之前,将汪伪政府当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谋略政权”,之后则将其当作配合日军侵华战争的傀儡政权,确保汪伪政府理解,并全力支持其侵华战略。 |
| 日本外务省 | 强调政治手段,以及利用整个国际环境采取综合措施,反对军方“谋略工作”,鼓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导“重庆工作”,并同时从多个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 | 对军方有所妥协,但仍强调自身特长,争取在对华决策上更大的发言权;计划加强汪伪政府实力,发挥汪伪政府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但也不惜为“解决事变”牺牲汪伪政府。其下所属的使领馆系统也有激烈反对过早承认汪伪政府,主张优先诱降重庆的声音。 |
| 汪伪方面 | 认为日本当局进行的“和平工作”几无成功可能,日本当局要实现对华战略目的,须将重点放在加强“新中央政府”上。 | 虽不得不对日本当局的“重庆工作”表示理解,但对其前景不以为然,不满日本当局在汪、蒋之间的摇摆,要求日本当局加大对自身的支持。 |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自相矛盾、复杂多变、难以统一,这主要是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抗战形势迫使其不得不随时调整对华政策,但根源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使得日本当局难有坚定的、自信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和政策。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矛盾,不仅没有随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而消除,反而被迫不断地修正对华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后调整对汪政策的契机。

(本文在“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上得到步平、黄天华等先生的指点,以及其他参会者的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作者张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